

下册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毕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下册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华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第十三章 现代性的文化

罗伯特·巴芬顿(Robert M. Bufington)

威廉·弗伦奇(William E. French)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发动的政变,即图斯特佩克革命,使他登上了墨西哥总统宝座,把国家似乎无止境的现代化追求推到了一个高潮。从墨西哥最后一个长期稳定阶段的末期即18世纪后期,开明的波旁王朝统治者进行改革起,在一个多世纪中,墨西哥的改革努力屡受挫折,而现在许多墨西哥人都热切地向新政权宣誓效忠;尽管小心翼翼,但还是期望与后者共度一个漫长的蜜月。新娘可能有点衣衫褴褛,但依然可爱;虽说新郎的血统并不完全是蓝色的(据有些人说,这是因为其祖母是个米斯特克族印第安人),但他确实很活跃也足够奉行自由主义。婚姻几乎是完美的,或者说看上去如此。宣传者抓住时机,鼓吹一个“秩序和进步”的新纪元开始了,它将最终结束数十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衰退和社会恶化。一位评论家曾如此评述道:“国家满目疮痍,但却拥有有史以来最团结一致、最迫切也最坚定地渴望和平的民众。”实际上,墨西哥人对现代化的崇拜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35年和平期里得到了最纯粹的表现。

397

19世纪时诸多前往墨西哥的访问者中最受尊重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曾称墨西哥为“不平等的国度”。令人惊讶的是,在

398

这样一个国家里,各阶层的墨西哥人都怀有现代化的梦想(尽管有不同的表现)。1886年,在墨西哥城著名的国立预备学校,迪亚斯政府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长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a)发表了一首典型颂扬现代技术的华丽颂歌,他在讲话中鼓励学生“要以深切的热情学习电学,获取其秘密,将其转化为可更新我们的财富的机械力展示给我们,把它们输送到世界各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与此同时,在北方边境,民谣歌手带着一点夸耀和些许渴望地歌唱着传说中的豪哈城: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不穿凉鞋,不戴草帽,因为那里所有东西都物美价廉。”对于一个依然支离破碎、忙于跨过门槛的民族国家来说,现代性所经常包含的矛盾并一直含混的概念,却散发出一股无法抵抗的诱人力量。



图中坐在一辆豪华敞篷马车中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在其漫长的统治期中,成了现代墨西哥的化身。除了1880—1884年这四年外,迪亚斯从1876—1911年一直担任总统。

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概念的矛盾性和含混性能很快被看到,或被公众知晓。相反,在欧洲实证主义大师孔德和斯宾塞的“科学”社会学的启发下,通常被认作是迪亚斯专家治国顾问的胡斯托·谢拉以及他

的同仁“科学家派”(científicos)之类的理论家,并不把这种潜在的不调和看作是种族和阶级的长期不平等。相反,他们精巧地制作出了民族救赎论,称这将使墨西哥免受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落败的极大侮辱。谢拉在一篇名为《墨西哥:其社会进化》的文章中发出警告说:

科学……已百倍地加快了某些民族的进化。其他人群或者变为从属者,并失去自我意识和人格;或者在理想和道德力中发现力量……并往往在完成自己人格的过程中吸取每一种外国元素,从而加快其进化的步伐。

面对“强大的美国火车头”再一次摧折幼嫩的民族精神这种可能性,就像其在不久前的1848年所做的那样,谢拉这些墨西哥实证主义者欢迎迪亚斯将军的坚强铁腕和“意志来统一我们的道德力量,并把它们变成正常进步的运动。”

399

科学家派的论据是合乎逻辑的、民族主义的并带有世界主义的,而且是达尔文主义的,充分显示出其“科学性”——完美地适应其有自觉意识的现代听众。他们认为,政治稳定在墨西哥社会进化中是关键的第一阶段。通过强调人权等“形而上学”概念和利用诸如“联邦主义”之类的“外国”体制结构,共和国早期和革新运动的宪政派自由主义者曾经过分激进地企图与过去决裂。由此而发生的政治斗争毁坏了经济,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因此,迪亚斯将军救赎性的规划是对一个半世纪多的政治放任和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必然的历史矫正。这一时期的动荡是三个世纪的殖民地时代衰退的继续,一位评论家说道:“其破坏性的呼吸已将人们的生命倾倒入血河之中,扼杀了活力的源泉,并把理想化的爱情遏制在花粉之中。”除此之外,政治稳定可能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如可靠的市场、稳定的货币,诸抵制如攫取土地和强征苛重税收等不合理的要求,保障财产安全的权利,消除产生贸易和投资不景气的因素。

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所创造的和平的支撑下,至少其初期被外国

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将使濒临死亡的墨西哥经济得到复苏。从短期来说,较多的资本投入到采矿、出口农业和制造业等这些主要产业之中,更多的政府收入也加大了对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和公共工程项目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这些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从长期来看,一个强劲的经济也将给社会利益带来如下的好处: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谢拉将其称为“进步的阶级”),对公共教育的不断投入——这是一帖改变社会不平等的自由主义猛药。不断增强的向上运动的力量可扩大国内市场,后者将加快经济发展,从而可进一步加强向上的运动,以使经济和社会进步得到螺旋式的提升。一旦形成了如此的运动,现代性就会毫不费力、甚至机械般地将其自身复制到可预见的未来中去。

在墨西哥的地平线上,几乎看不到成熟的现代性;而且更难想象出它的结果。满怀热情的墨西哥精英们聚集在索邦^①、伯克利等外国的大学里,或广泛游历,从西欧到美国进行必不可少的考察。但是,这些启示性的浏览需要蒙上眼睛和心甘情愿地停止怀疑。毕竟,即使是巴黎这样的19世纪文化之都也有“流氓和暴徒”(虽然他们只是扰乱城市而不是跨国违法)。

400 但科学家派对一件事是坚信不疑的:从经济发展中将会涌现出一系列辉煌的未来场景。它们可能是各种不同事物的集成:先进技术、资本主义经济学、现代社会关系(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董事会、企业家资产阶级、爱国的无产阶级,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稳固的核心家庭基础之上),最后是民主政治(但只有当墨西哥准备好了的时候)。最后那个东西是对自由主义原则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再次肯定,甚至是政治合法性的试金石。谢拉坚持认为:“墨西哥的社会进化在没有取得其最终目标‘自由’前,都将是完全失败和无效的。”不过,即使它具有民族的乐观、科学的主张和自由主义的目的论,这种渐进主义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本国人口中90%的人(精英们选来称呼他们的绰号是“低劣的下

① 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注

里巴人”)是不利的,因为这些人将不能够分享波菲里奥·迪亚斯现代化的直接成果。

现代性本身固有的许多更为矛盾和含混的东西,就潜藏在科学派意识形态的表层之下。有些尽管令人不安,却是显而易见的。墨西哥城活跃的小报经常批评对现代性的波菲里奥式崇拜。譬如,1904年《孩童报》(*El Chango*)上的一篇讽刺文章“电死”,把街道上的新式电车及其“每天大量受到伤害的人们”谴责为一种现代技术无情感残忍的象征,它们用无情的轮子把许多人压成残废甚至死亡。

现代化的社会行为方式也没有免受讽刺性的责骂。配有通俗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木刻画的连珠炮似的谴责,提醒工人阶级读者对“女权主义”以及一种波菲里奥“时尚”对性别区分造成的危害,因为后者居然容忍穿正式礼服的漂亮男孩(*lindos*)和男扮女装者一同出现在公众舞蹈之中。此外,社会改革精英们,不管是不是科学派,几乎都不提倡豪哈城这样一种“安乐园般的城市”——在那里,“他们打击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追求幸福更甚于工业生产,必将完全破坏现代性的永恒动力。这些深刻的对立立场还只是世纪之交隐隐呈现在社会工程师们(巧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墨西哥)前面的冰山的一角。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出口导向的波菲里奥发展模式的结构矛盾注定了墨西哥向现代化的航行将充满险阻。外国人实际上进行了大量投资,1884至190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以8%的显著增速在增长,这一段是波菲里奥试验中最太平的日子。然而这种增长只是加剧了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传统的不协调因素。毫不奇怪,富者更富,并把他们新获取的财富大量花费在进口奢侈品上——室内卫生设备、电灯、汽车、巴黎样式的公寓大厦,这些东西既反映了他们的传统地位,又表现出一种摩登的追求。

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自然也以政府职位和出口经济中商业机会的形式流向中产阶级。但“低劣的下里巴人”只是偶然地、有条件地和有选择地获得了些好处。只有极少数人设法跨越了“雇工”(peónes)或

“穷光蛋”(pelados)与“进步阶级”间的鸿沟。一个世纪后,洪堡直言不讳指出的社会特征依然在真实地显现。虽然这些社会不平等很少引发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但其分裂的潜在力量却是相当可观的。

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阶级不平等并非墨西哥唯一的结构性矛盾,也不是最具有分裂性的矛盾。当时正值国家巩固的关键时期,但不均衡发展却可能会造成国家的更进一步分裂。一方面,与出口相关的经济部门——龙舌兰纤维、糖、咖啡、纺织品、矿业和钢铁等产业吸收了国内外的资本,它们激励了(有时是很成功的)从技术和金融到工作节奏和劳动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各地区很不相同)。另一方面,与地方和区域市场相关的经济部门,特别像玉米和小麦生产这类产业,却抵制革新。

不平衡发展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地区差异上。墨西哥中部的传统谷物生产庄园与北部和东南部急速发展的外围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使在现代经济部门内,更为多样化的北部经济与南方单一农作物种植经济也少有共同之处。更为复杂的是,墨西哥热衷于吸纳外国投资和开拓国外市场虽然增加了经济机会,但也加深了对全球经济力量的经济依附,并容易遭受后者的打击;正如它在增强中央集权的墨西哥国家的财政和技术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它应对特定的本国需求和关注的能力。现代化的提倡者已许下了物质财富和安全的诺言,但前者是分配不均的和有条件的,而后者仅是一个谎言。

传统社会关系中的猛烈变化有些是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引起的,另一些则是其提倡者期盼的文化力量造成的(其中包括谢拉说的“外国因素”),这些变化可能会铸就一种墨西哥民族文化,并往往是以目的交叉的方式起着作用。从18世纪晚期波旁王朝的改革者们开始,自由主义者们对教会、军队和自治的印第安人公社等社团组织发起了攻击,力求削弱建立在群体认同和相互义务关系网络基础上的传统殖民地社会关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改革和内战,社团组织已丧失了原先拥有的大部分权威,但对这些群体的认同却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

着影响。

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奔走在日趋强大的波菲里奥政府内外的现代化提倡者们扩大了他们对社团的攻击,开始打击一切形式的传统社会关系。他们的目标是用建立在所有成员共享的、普世的、抽象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社会来替代建立在地方忠诚和认知形式上的传统社会。他们认为这种感知上的一致对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波菲里奥·迪亚斯这个大家长本人,也认为“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应接受相同的训练,这样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才会变得和谐,对国家的认同也会得到强化”。为了这一目的,要坚定地把“进步阶级”中的妇女(连同她们的宗教倾向)推向家庭的私人圈子之中,以完成铸就未来(男性)公民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平民妇女则要接受为工厂劳动而准备的职业培训。要通过世俗的公共教育,把墨西哥依然存在的美洲土著人群从充满迷信的野蛮人变为社会的财富。19世纪初,自由主义者曾尝试过一场他们设想的法律革命,从而使墨西哥社会得到一番翻天覆地的改造。他们的实证主义后继者们保留了这一目标,但是改变了手段。这些人认为,应先行塑造公民的文化而不是先给予他们法律上的公民权。

402

这种波菲里奥式的文化革命也并不是全无效果。一个成果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基础首先是赋予理性的(即被界定为科学的)知识,尤其是反思性知识以某种特权地位,这种知识不仅仅要积累,而且在过程中还要经常修正其自身。因此,这种理性地运用到人类环境中的反思性知识提供了一种在后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无限螺旋式上升的力量,而政治稳定和经济现代化更使其成为可能。

然而在实践中,反思性知识往往推翻了曾经假定要去修正的东西。譬如,最新收集到的波菲里奥时期的犯罪统计显示,在该政权下犯罪率急剧地上升,这与它被歌颂为“秩序和进步”恰恰完全相反。反思性知识没有想到的结果有时可能会动摇那些最饥渴的现代主义者的信心。

但是这种令人不安的结果甚至会更深入地破坏现代社会的黏合剂——新的信任观念,信任抽象系统而不是个人荣誉,信任科学原则中

而不是地方性知识；它黏合起的这群民众不再从出生起就被各自小小的家乡(*patria chica*)的社会和生活节奏所束缚。在这新设想的民族社会中，地方政治首领们的腐败，甚至例如龙舌兰酒掺假这类事都会变得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意味着对地方道德体系，而且也是对民族信任的一种侵害。同样道理，波菲里奥·迪亚斯在其任期内大多数时间中如此熟练操纵，并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稳定十分重要的关系网络和政治交易，最终弱化了他的政权，并削弱了他倡导的计划。现代性应保障安全，但实际上它却造成了所有历史事件中最矛盾和最含混的东西：社会革命。

波菲里奥统治下的墨西哥经常被描绘为上演伟大革命的场所。这种基于实证主义宣扬的不可避免的社会进步的解释，既歪曲了历史场景又使其过分简单化。即使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努力实际上是不完善、往往是不真诚，有时是完全失败的，但终结波菲里奥政权的那场革命并不是不完善、不真诚，或失败的现代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它也不是依附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依附性严重扭曲了发展的进程，并由此造成了很大的内部压力。革命是从现代性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含混中形成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新的全球社会的动力边缘上成长起来的。历史运动的任何变量——波菲里奥早逝、有一个可接受的继承人，甚至只是说不清的好运气——都可能预防发生以驱逐迪亚斯为核心事件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暴力斗争。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还是发生了。据说波菲里奥·迪亚斯逃离墨西哥流亡巴黎时曾谈起他的后继者：“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已经释放了一只老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否能驯服它。”这段评论也正好可用作他自己的碑文。

秩序是波菲里奥政权的存在理由。在证实其反对民选政府的叛乱为正当行为的1876年图斯特佩克计划中，迪亚斯将军就大声抱怨说莱尔多·德特哈达总统拒不遵守反对连任的宪法条款不断干涉各州和各市的政治，以及他针对“杰出公民”施行的严重暴力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出政治选举的“闹剧”、一个民主的“痛苦笑话”以及对正义的“强奸”。可迪亚斯自己以后也再次参选、行干涉和镇压之举，这让这些早先的抱

怨成为造成尴尬和引来讽刺的根源；小报的编辑们更是嘲弄这位“甩不掉的考迪罗”的虚伪。只有当迪亚斯能够作出承诺要在一个暴力和分裂的国家中恢复秩序的时候，这些攻击的破坏性潜能才会受到遏制。迪亚斯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曾反思说：“我们采取了一种家长制政策，完全相信一种强迫实行的和平在一个天生聪明、文雅和热情的民族中能够使教育、工业和贸易成长出稳定和团结的因素。”无论是为了合法化，或者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该政权对秩序的痴迷为我们展现了此举的高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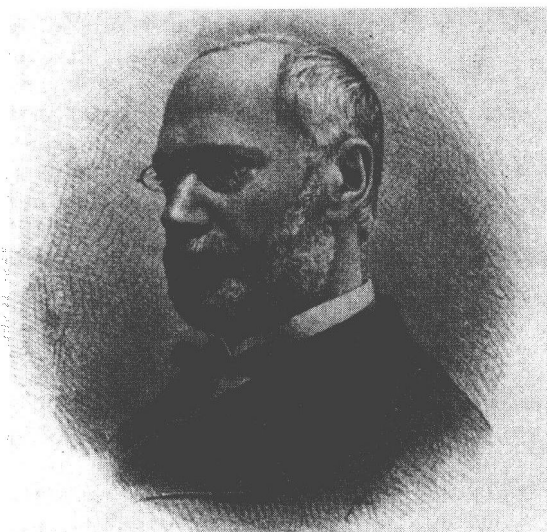
因此，毫不奇怪，该政权施展了一套范围相当广阔的方法——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现代的；有些明显表现出国家权力，有些为了驯服墨西哥那些不同种类、经常进行顽强抵抗的人们而更具有灵巧的强制性。正如改革精英们看到的，其目标是要打造胡斯托·谢拉所谓的一种“民族魂”。官方的路线是：由于墨西哥人缺乏民主政府和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自我克制，因此就需要一套纠正性和预防性的措施用于克服这种阻碍发展的多年障碍。总而言之，这些方法是相当成功的，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

在这一综合背景下，驯服人的工具就是不那么隐蔽的国家暴力威胁。迪亚斯先生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过：“有的时候，有一点大炮的烟尘并不是件坏事。”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这种事还真不少。

第一个项目就是处理政治反对派。迪亚斯并不是唯一对莱尔多1876年违规连选连任不满的政治强人。最高法院院长何塞·马里亚·伊格莱西亚斯拒绝批准大选结果，并同时宣布反对该政府，从而对依然可将叛乱成功地加以控制的现任总统给予了致命的一击。莱尔多流亡之后，迪亚斯就寻求与依照宪法程序继任总统的伊格莱西亚斯进行交易。而当后者拒绝合作时，迪亚斯在很短时期内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他依然尊重民主惯例，于1877年正式当选总统。

404

如果说许多墨西哥人欢迎和平的降临，那么迪亚斯的政治对手就极尽所能地破坏和平。在其第一届四年任期内，莱尔多的支持者们从相对安全的美国边境发动的一系列叛乱就被迪亚斯的军队，或其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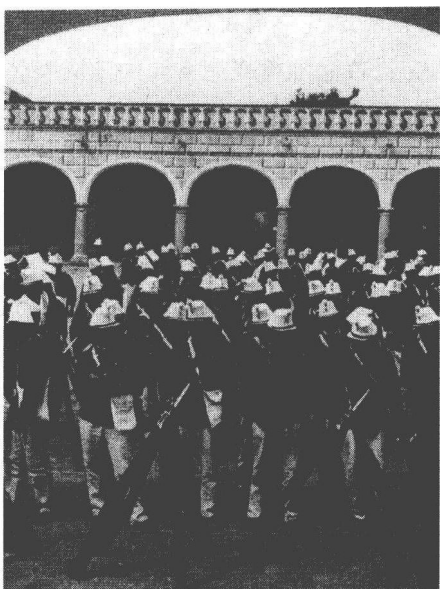
何塞·玛丽亚·伊格莱西亚斯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也是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对头，1876年迪亚斯发动的图斯特佩克革命迫使他辞去了总统一职。

的同盟者(如新莱昂的卡西克赫罗尼莫·特来维菲奥)的军队轻易并且往往是残酷地镇压下去。那些不满的将军们——有些人抱怨分赃不均,另一些人则抵制迪亚斯国家机器不断增大的权力,都面临着同一个命运。而那些名声更小的政治对手也是如此,不论他们是被逐出土地的农民,或是持不同政见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当韦拉克鲁斯州州长路易斯·米耶尔-特兰(Luis Mier y Terin)询问他如何处置被控煽动暴乱的九位当地人时,据说迪亚斯用电报回答说:“立即处死。”不管是真是假,这一经常传播的轶事显示了总统对其潜在对手的解决方式。但迅速成长的电报线、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该政权处置公共秩序内部威胁的能力。

现代化也使迪亚斯政权对墨西哥乡村的灾祸——匪徒强盗逐步加强打击,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并展现其功效的方式。从已发表的旅游者的描述来看,墨西哥的盗匪是他们经常烦恼和谈论中的一个问题。19世纪中叶,西班牙第一任驻墨西哥大使的苏格兰-拉美裔夫人“范尼”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曾形象地描绘过一个声名狼藉的“盗匪头目”,他“身披一条黑色毛毯,头戴一顶黑帽,帽檐低垂下来遮在他的脸上,其脸色如死人般苍白,双眼似虎眼,或其他食肉野兽的眼睛”。当时的法国

大使曾讥讽说,盗匪帮派是墨西哥唯一按照“完美规则”行动的组织。这些在 19 世纪中叶旅游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评论,可能会使国际上的读者感到好玩和愉快,但也可能严重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而墨西哥的决策者们正在谋划着要这群人对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

更坏的事情是,喜欢抢劫的印第安人,包括阿帕奇部落头领赫罗尼莫和维克托里奥等人在内,经常穿越美墨边界进入墨西哥,袭击小村庄,抢劫旅游者,破坏贸易。对于这些抢劫的戏剧性报道,尤其是在北美报刊上的



迪亚斯总统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使本国军队变得现代化、职业化的改革,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有可能获取的最先进装备。

报道,更是刺激了对到墨西哥进行投资的安全性的关切。迪亚斯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用历史学家路易斯·冈萨雷斯的话来说就是:“干净的来复枪”。

在挥舞那把干净的来复枪时,迪亚斯和他的部长们并没有依托军队(他们也经常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是依靠了贝尼托·华雷斯在 1861 年创建的国民警察部队——墨西哥乡村骑警队(rurales)。在图斯特佩克起事之前的混乱政治气候中,训练无素和组织性差的乡村骑警队所造成的公共秩序问题几乎与他们所解决的问题一般多。但到了 1880 年,当迪亚斯暂时放弃其总统职位让给他的军队亲信曼努埃尔·冈萨雷斯的时候,乡村骑警队的人员已增加 90%(达 1 787 人),资金增加了 400%,这使它变成了迪亚斯维护秩序机器中的忠实基石。

有赖于铁路、电报和公路的扩展,乡村骑警队也将日益变长的国家之臂伸展到墨西哥的乡村。对大胆追捕匪徒以及与匪帮们(如韦拉克

鲁斯难缠的桑塔农和艾拉克里奥·贝尔纳尔,以及“锡纳罗亚霹雳”等人)进行激烈枪战等事件的渲染报道提高了军队在坚韧性和正义性上面的声名(尽管军队组织实际上既枪杀匪帮,也枪杀乡村骑警队,并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袭击罢工工人和镇压起义农民上,而不是去追逐“强盗头目”)。尽管如此,盗抢行为和乡村无秩序状态仍贯穿了整个迪亚斯统治时期。比如,直到1910年,桑塔农才被抓获;在迪亚斯政权末期,还爆发了一些最危险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叛乱。

事实是没有什么重要效果。既然迪亚斯政权当务之急是打消国内外投资者的疑虑,于是形象问题(在这方面就是秩序形象)就成了第一位的。在这方面的努力中,乡村骑警队显示了他们的真正价值。这些人穿着传统的墨西哥牛仔服装,本身看上去差不多就像个凶狠的盗匪(这正是该政权的评论家们所宣传的一种虚假形象),并成为遍及墨西哥全国的公众阅兵和牛仔竞技中的主要角色。后来又受国际著名的布法罗·比尔的“狂野西部秀”的启发,乡村骑警队又前往国外表演,以难以捉摸的面貌、异国情调的穿着和华丽的马术吸引那些具有鉴赏力的外国观众。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当乡村骑警队将一种表面上的秩序带到了具有高额外国投资的地区,并经常支持外国业主和监工竭力控制不受拘束的墨西哥工人的时候,这种外表靓丽的形象就有了其实际的意义。虽然乡村骑警队不总能在墨西哥的乡村恢复秩序,但这已足够有效。

虽然没有乡村骑警队的形象那么浪漫,但墨西哥城警察外表上的法式职业化和在首都较好街道对警官进行的战略配置对制造稳定的假象还是有贡献的。当迪亚斯手下的科学派自诩努力收集的“科学的”统计数据揭示墨西哥城的年谋杀率(1%)比加尔各答还高时,他们不禁感到十分沮丧。但科学派法官米格尔·马塞多1897年在向律师们发表的演说中还是说:“在中等和上层阶级中,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个人安全感觉,其表现就是行动非常自由。”迪亚斯治下的墨西哥存在着大量的平民暴力,但它对国内外正在致富的阶级却没有造成什么威胁。

此外,在统计数字之外,稳定的假象造成了一种真实的差异。当新

世纪开始时,外国旅行者们都在谈论墨西哥社会中那些具有民俗风情、离奇有趣的方面,而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这里看上去秩序井然。比如,美国旅游作家查尔斯·弗兰德劳在名为“万岁,墨西哥!”的报道中写道:“除了少量身挎可让人看见的巨大左轮枪的公务警察似乎在每个角落都出现,并在发生轻微违法时出现外,公路都由乡村骑警特别小组进行巡逻;乡村骑警队的人员在四到五千人之间。”

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转变,美国国务卿艾利胡·鲁特(Elihu Root)表示,他信任“不可或缺的考迪罗”本人。他说道:“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感到一生的坚定忠诚都不足以回报他给我的祖国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辞使迪亚斯获得了“墨西哥之主”的绰号和国际声名,后者反过来又给墨西哥带来了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和西班牙比塞塔。“一点点的大炮硝烟”(同时稍加宣传)实际上“不是件坏事。”

407

不过迪亚斯先生也率先承认,现代社会,特别是追求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并不是由大炮的硝烟调训出来的。就在墨西哥独立之前,各式各样的墨西哥社会改革者——波旁王朝的管理者,开明的保守派以及自由主义者,如同他们的欧洲同行们一样,都赞成现代的调训制度应建立在校舍、军营和教养所的基础之上。要驯服殖民地的臣民,可能可以依靠专制的法令驯服,以及在他们起而反抗时加以恐吓和惩罚,但现代公民却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学会规训自己。国家暴力的明显威胁可以安抚外国投资者,但墨西哥几代改革者都认识到:只有心灵纯洁的人——道德的公民才可捧得现代化的圣杯。

但要培养出广大的公民群体非常艰难。虽然墨西哥的公民是在核心家庭的怀抱中出生和养育的,但他们的公民品德却可能更多地受到母爱和宗教的搅扰。因此,民族和国家对其公民群体的形成非常关注。为了这一目的,墨西哥的决策者们倾向于运用其欧洲和美国同行们开创的控制社会的现代技巧:强制性的世俗公共教育、专门的军事训练和重塑人格的教养制度。之前已经迈出了几大步。华雷斯的实证主义教头加维诺·巴雷达于1867年创办了国立预备学校,以培训新一代



华金·巴兰达 (Joaquín Baranda) 是迪亚斯总统最亲信的顾问之一,也是墨西哥人称之为“科学派”(Científicos)的实证主义群体的一页。这个群体倡导墨西哥应对外开放,以带来他们认为就是现代化的那种经济增长。

408



胡斯托·谢拉至今仍是墨西哥城产生过的杰出教育部长之一。他也是当年主宰了政坛的实证主义群体中的一页,为创建墨西哥国立教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的政治决策者和“科学政治”教育家。华雷斯的司法部长马丁内斯·德卡斯特罗于 1871 年起草和颁布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刑法典。然而,这些只是最初的步伐,真正的工作还有待完成。如果社会改革者们懂得纪律和诚信是现代化的双面螺旋,那么迪亚斯治下的和平第一次提供了把这些现代化的训练技术带到墨西哥的真正机会。

有可能普及到所有墨西哥儿童的公共教育是该政权的头等大事。墨西哥强大的联邦主义传统(尤其是州和市政府的权力)造成了困难。但 1888 年,教育部长华金·巴兰达在得到迪亚斯的同意后,推动国会通过了立法,将联邦区的免费义务教育计划推广到全国。两年后,其后任胡斯托·谢拉在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发出警告说:“我们的生活已用铁链与世界的工业和经济生活连在了一起……通过我们可以自主决定的公共教育,必须各种不同习惯、语言和需要所产生的离心力量转变为凝聚力量。”在基层,有关道德教育的文章告诫小学教师:“要唤起(学生)对工作、国家、他人、正义及真理的爱;要尊敬法律和宪政政府。”面临着如此多的问题,迪亚斯时期的教育家们热衷于对下面一些议题展开激励的争论,如:科学在学校课程中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公共教育是否能把印第安人转变成“社会财产”,等等。教育一时非常热门。

409

成就是显著的。从 1877—1910 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入教育的预算百分比翻了一番;小学入学人数是原来的 3 倍;识字人数比例从不到 15% 增加到近 20%。1910 年时,联邦区的居民半数以上可以读和写。为了保证稳定地提供经过培训的教师,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师范学校。1895—1910 年,教师人数从 12 748 人增加到 21 017 人,即从每 1 万学生配置 10 个多一点教师增加到每 1 万学生配置到近 14 人。这是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所有行业中增长率最快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世俗性的和公立的。利用迪亚斯政权默许的宽容政策,天主教学校的数目从占全国学校总数的 4% 增加到近 5%。就连新教传教士学校也获准开办,到该政权末年,新教学校的入学人数已达 12 000 人,是原来的 4 倍。为了监督这种扩张,1905 年成立了一个由胡斯托·谢拉领导的国家教育部。在州的范围内,具有教